



专栏

责任编辑:沈飞 美编:廖渊 2006.12.9 星期六 邮箱:flyhow@ssnews.com.cn 电话:021-38967626

Column

■知无不言

怪哉! “1+1<2”



袁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小时候在乡下的土地上劳作时,常见邻村一位四十多岁的汉子,骑一辆半旧自行车,挂一个破皮包,穿梭于各村之间,因为不用像我一样在烈日下的田野里流汗,很是羡慕。后来知道他是农村信用社的信贷员。现在想来,他应该是我最早接触到的“金融专业人士”。去年,有机会为一个经济大省的各市县农信社负责人讲课,听“省联社”的朋友介绍近况尤其是将来的规划时,心生很多疑问,便开始留意有关农信社的改革和发展情况,渐渐地疑问越来越多,对最近几年的一种趋势也就越发忧虑。

按理,1+1等于2,而“理性经济人”追求1+1大于2。但眼下农信社改革的某些设想与做法却是“1+1<2”,不仅有违日常道理,更不符合经济学原则。几年前,不少省份酝酿农信社的“加法改革”,将原本属于独立法人的县联社与地市级联社合并,建立以省为单位的农村商业银行。为此,纷纷成立了“省联社”,由省府高官与省直部门官员担纲,按商业银行格局设立相应职能部门,推进“农村商业银行”的组建与挂牌。但绝大部分省市的进展并不顺利,受到了强烈阻挡,但是既然已设立了专门机构并配备了主要来自省级政府的人员力量,这些力量就会想方设法去寻找理论与政策依据,甚至游说新的政策出台,按其既定思路与愿景去搭建“庙宇”,这“1+1<2”的改革也就有可能做成并蔓延开来。

前几次笔者在本专栏都谈到,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撤出乡村,目前“留守”农村的惟一体制内正规金融机构就是农信社。这类机构基本以县域为范围组成独立法人性质的县联社,规模不大,以小额贷款方式服务于“三农”或者乡村企业。从我所了解到的一些较为发达的县域农信社情况来看,存款规模在30至60亿元左右,在这一规模内,农信社在自己所熟悉的本土范围内,对经济主体以及本地经济政策等信息基本能够掌握,“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较少,在其放贷领域与客户确定上较少“逆向选择”,因而其运营符合经济学上“范围经济”或“规模经济”的原则要求,并随县域经济的发展而在存贷款规模与业务方式上也能同步增长与创新,不会发生那些已撤回城市的大型商业银行因为农村客户零散、贷款琐碎而面临所谓“不经济”的问题。

当然,农信社在县域范围内也受到行政力量与人情因素的干扰,也有数额不小的不良资产,但伴随前些年中央政府通过中央银行用1654亿元票据置换以及财政补贴与税收减

免等方式予以化解,在历史包袱大大减轻的同时,县级农信社的机制有了较大改进。由此完全可以说,就全国而言,农信社几乎是农村经济主体获得金融支持的唯一来源,这类机构的“合作制”产权制度安排,符合目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实情。

但是,如果像眼下那些省级权力机构所“雄心勃勃”设想的那样,将一省范围内的所有县联社在行政力量的强行干预下,合并组成“农村商业银行”,将极大扭曲与损害现行较为有效的农信社的性质与职能,尤其是将会损害本已相当薄弱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这样做的消极作用至少有:一、具有较强地域信息优势的县联社的独立法人地位被剥夺,变为一省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丧失了自主信息搜集与决策的权利,对当地农村金融服务的细致程度难以与原来相比;二、几十家基本完全服务于当地县域经济的农信社变为一个商业银行法人,原来对一家县联社而言成本核算的信贷服务对一省规模的“农村商业银行”将不再核算,不可避免就会重蹈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离乡返城”的覆辙,尽管名字叫“农村商业银行”,其运营实质将很快蜕变为“城市商业行”,最后一层“留守”农村的体制内金融服务体系也由此名存实亡,而原本已非常激烈的城市区域里商业银行竞争程度却进一步加剧,造成信贷资源的更大浪费。三、行政性强行合并,无疑将风险因素大大集中,使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农村合作信贷”机制处于极度脆弱之中,很可能过不了几年,这一资源便消耗殆尽。四、极大方便了省级行政机构对这一金融服务体系的干预,甚至可能“沦落”为省政府的“第二财政”,将银行信贷“财政化”与“行政化”,必然加速这一信贷资源的衰落,过去几年依托省级行政力量建立的信托投资公司与证券公司的大面积破产不就是明证吗?

所以,那些能够左右这一领域改革方向与方式的决策者们,即使难以一时站到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高度,仅仅为了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健康推进,也应当终止这一违背农村经济现实与经济学道理的错误做法,还“农村合作信用社”以真正自愿平等的市场化原则与机制,从政策与法律上确保农村信用社最多以县域为范围的法人构架,做实做细县域信贷服务,切实稳定并不断强化这一仅存的体制内成规模有成效的农村信贷服务机制,服务并支持于县域经济的复兴与发展。

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没有根本改革之前,就农村信用社的体制改革而言,其原则还真的是“小的是美好的”,宜小忌大啊!

■德鲁克在中国

“听不到不同意见不做决策”



黄建安
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培训总监

德鲁克很早就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做顾问。上世纪五十年代,尽管老斯隆当时已经年过七旬,但他还在管理公司。那时,公司高层基本形成了“听不到不同意见不做决策”的决策理念。因此,在每次开会时,大家彼此激辩已经成了习惯。有一次,德鲁克出席公司管理层会议,一位管理者提出了一项建议,听上去非常好,给人印象深刻。但是这一次,与会者,包括老斯隆先生在内,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老斯隆围着圆桌逐个问道,你觉得这件事有什么

不对吗?大家都说没什么不对,这时,老斯隆说,我也认为没有什么不对,因此我建议延后一个月再讨论那项建议,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重新考虑一下。一个月后,这个建议被否决了。

在讲完这段经历后,德鲁克说:“决策并不是个人喜好的竞赛。好的决策并不是在喝彩中决定的。它是由正确的认知而决定。要正确的认知,你就需要有异议。需要给自己一个仔细思考的机会。”这里德鲁克明确提出了“异议”,或者“不同意见”在决策中的作用。

不妨回顾一下中国的决策。比如,在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决策中,不同意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反对派”对三峡工程也做出

■边走边唱

企业家的真正财富



丁栋虹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

什么是企业家真正的财富?在一片器嚣尘上的有关中国企业家财富的排行榜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相关事件的声浪中,这个问题显得是那么孤独,极易招致众人的白眼:嘻,这有什么讨论的必要?企业家的财富不就是他们口袋中的钱吗?

对于一个在几千年中都在为生存而挣扎、在近代还屡经饥荒、刚刚脱离吃不饱不过20余年、还有部分群体没有达到过温饱的民族来说,以金钱(货币积累)而体现的财富意义是巨大的,百姓对企业家金钱财富的重视因此容易被理解。但对于一个崇尚理性与科学的民族来说,如此答案却是个悲剧。对于一个寻求事业发展与能力提升的个人,如此思维却会要了他的命——思维的错误绝对会终止他为了发展所作的正确努力。

对于企业家的财富是货币积累的沉重反话是:中国历史上

并不缺少有金钱财富的商人或政客(这在《红楼梦》等各种古典与现代文学名著中均可见证),但社会几千年为什么没有发展(如西方汉学界所称的没有线性意义上的进步)?上个世纪中叶,在将以金钱财富形式体现的资本家的工厂与地主的土地收归国有、分配给贫困的佃农之后,为什么没有出现预期的经济发展?当今国人的财富无疑在急速膨胀,增速甚至位居世界前列,可是同时,为什么道德失衡、关系失信、行为违法等现象也在急剧增长并呈扩大之势,社会没有实现应有的进步?

对于这些反话,国人至今没有真正深刻地思考过,学术界也没有以应有的勇气去直面。对这些反话缺乏理性与科学的认知,结果就经常导致社会性的民众盲动:偶然的一个事件与鼓噪,就会掀起社会性的摇摆甚至误动。结果不仅伤害了当事人,更严重地伤害了社会。

难道不是吗?中国的企业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地位,20世纪中叶之后几几沉沦,单就改革开放后的近20余年而论,受害事件也举不胜举。尤其是,在

中国企业家金钱财富排行的背后,深刻地隐含着与《福布斯》对西方企业家财富排行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后者呈现的是对企业家价值的认同,前者体现的是对企业家价值隐含的不认同。如同娱乐圈对明星的窥私总想找出一点“是”与“不是”一样,中国人对企业家的探秘,也总想找出一点“不是”来。中国现实中的企业家似乎芒刺在背,生活得多少有点不自在。

那么,企业家的真正财富(价值)究竟是什么?一个有关洛克菲勒的故事诠释了一切:洛克菲勒自小生活贫寒,甚至捡过破烂,后来靠石油投资立业致富。鼎盛时期,他的财富曾经达到美国国民财富的四十分之一;上个世纪初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联邦政府曾经向他借钱。可他并没有因巨富而改变自己的平民生活本色;在出差与旅行中,他总是选择坐飞机的经济舱,住一般旅馆。而他的儿子则选择了坐头等舱、住豪华旅馆。这种反差让人奇怪,于是有人问他这是为什么。他的回答是:“因为我的父亲是个富人,而我的父亲是个穷人。”

■求索

望东京 念京沪

——“漫走早稻田”之一



陈宇峰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学21COE-GLOPE研究中心国际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在东京的很多生活区,大多数是两、三层小楼,没有北京、上海那些拥挤的摩天大厦,也没有中国大城市人车人住的喧嚣和满街的汽车喇叭声。很多时候,我甚至怀疑这不是在世界的都市,而是走在家乡的某个江南小镇,而是走在家乡的某个江南小镇。你简直不敢相信,这如何能安置下东京的一千二百万人口呢?联想国内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档住宅区以及那些高楼大厦,还有没有连东京人都摇头的房价,我总要自问,一个大都市的档次到底靠什么来体现呢?国内房地产市场到底缺少了一些什么呢?

前几天,从朋友那里惊闻国内房地产市场出现一种“市场倒退论”,起因是温州市营销协会通过当地的一家房产公司拍得一块政府出让的15650平方米土地,那里将产生全国首个个人集资建房项目。根据工程预算清单,它的开发成本价不到周边商品房市价的一半。这本来是一件很不错的喜事:个人集资建房尽管还是市场的少数情况,但它意味着一个成熟房地产市场在中國的开启。不过,也有人无酸醋地宣称,这违反了市场的基本规律,是市场的倒退:“违反了社会分工的规律”,“这种行为否定了企业家才能……房地产开发活动十分复杂,内部分工也已经很细、很

专业化,认为大家合在一起就能干的想法如同小孩‘过家家’一样天真,合在一起的‘大家’也远不是一个稳定的组织,随时会解散。”原来在这些所谓的社会精英眼里,摩天大厦,高档住宅……才是房地产市场的本质,才是城市化、工业化的伟大胜利!那就让他来日本这个具有相似文化和发展之路的地方来看看:这里多的是普通小楼,谈不上什么高科技,高壁垒。只要你有地,你有权,你愿意把房盖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莫非东京这些自建的小房子都违反了市场规律?是市场的倒退?

我来东京之前,GLOPE办公室就替我们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小套间,房租是我将近三分之一的工资收入。为此,办公室秘书铃木小姐在mail中一再抱怨东京住宅的昂贵。不过,我住下后感觉还可以,贵也只是因为地段的原因。但是,这里的高房价相对于中国那些吓人的房价来说,却是“小巫见大巫”了。

现在似乎该回答为什么日本的房地产产能在如此小的地方容纳了如此庞大的人口的问题了。根据我这段时间的观察,东京有两个有力因素消除房地产市场可能产生的高噪声:首先,战后日本土地私有化,使得每个住户都获得土地,居民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建造自己喜欢的楼房,政府很少干预。尽管也有不少的房地产开发商去开地主的闲地。不过,也有人无酸醋地宣称,这违反了市场的基本规律,是市场的倒退:“违反了社会分工的规律”,“这种行为否定了企业家才能……房地产开发活动十分复杂,内部分工也已经很细、很

较细致,考虑到周边邻里关系、工作流动甚至几十年后的退休生活,往往不太喜欢买房子,更加喜欢租房。不喜欢的时候随手换一个,尽管有时不得不过花费他们工资的大部分,他们仍然乐此不疲。房地产的二级租赁市场不仅消化了相当多的东京人住宿存量,而且减少了相当多非理性的抢购行为。

是市场的竞争力量和理性的消费理念使得东京的住房虽然拥挤,但并没有北京、上海那么吓人的楼价。因为广大自有住宅的小竞争者加入,让房地产市场很快回复到一个正常的均衡价位上。很显然,中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在这方面尝试太少,竞争市场的自动恢复能力很差,重要的力量还是来自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但效果呢?有些地方非但没有遏制房价的上涨之势,反而产生10%的涨幅。如此看来,仅仅靠中央政府政策的强“堵”是不够的,不如敞开大门,引入更多的市场潜在者进入市场竞争,未尝不是一条好的出路!

市场风险、工程质量以及成本问题,也许市场潜在者在投资决策之前已经认真考虑过,也许没有,我们无从知道,也无须知道。市场的结果会告诉他最好的市场行为。如果成功了,他们将从中谋得利益;但如果失败了,他们也必然需要承担其中的一切损失。这就是一个成熟房地产市场的基本规则,也是漫游在市场之中的草根企业家的活力所在。刚刚仙逝的弗里德曼老人给我们留下了一句自由意志的至理名言:“个人的选择是社会繁荣的基础”,且让我们以市场的名义谨记之!

■蓄势天津

功夫还看金融之外



王恺
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在外界关注天津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创新如何动作的时候,天津人自身也许更需要冷静。就滨海新区目前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态势,抓住机遇而言,金融改革创新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或两者兼而有之?起码在近期如何侧重,需要三思。

所谓目的,就是谋求金融业脱离制造业依托,独立发展。促进城市的经济结构柔性化,金融引领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到GDP的比例超过50%,进入后工业社会,这是理想结果。退一步讲,达不到这一水平(目前国内无论上海还是深圳都离此很远),通过金融业的长足发展,成为地区性的经济中心,这个前景是很诱人的。

近几个月来,笔者接待过很多记者采访,提问最集中的是:“天津滨海新区与浦东相比,最大的劣势是金融,你们要大发展从哪里搞到钱?”“你们怎样解决钱的问题?”问得直率,也很直白。的确如此,滨海新区的下一步加快发展要靠内生动力,外聚资源,最稀缺的就是资金。看来,外界对滨海新区发展金融业关心的重点在于手段,局外人的不解、疑惑甚至担忧无道理由。

仔细想来,对滨海新区缺钱这一点在于你怎么看,不能绝对化。微观上看,滨海新区可能不缺钱,准确说是不乏融资渠道。目前新区掌握的六家上市公司,借助滨海新区概念,股价普遍上扬;天津港在香港上市,一次融资30多亿港元;津滨发展增融资扩股,机构投资者短时间内超额认购十几亿,如此等等。宏观上讲,国家开发行一次给新区授信额度达几百亿,加上渤海商业银行、滨海产业基金,以及传统金融机构的作用,资金投入滨海新区并不十分困难。

但又有不少人担心:融来这么多资金,以后怎么还?由谁来承担责任和风险?掩卷而思,这个担心是担到点上了。

正常情况下,在市场上流动、融通的资金,无一例外以资本的形式出现。按马克思的观点,资本的本质是运动的,不能停滞,一旦停滞下来,就还原成货币;但资本运动的目的是增值,要

不了解企业家的真正财富是企业家人格会犯大错误,对于个人是这样,对于社会也是这样。中国对企业家和他人认知的经常是平面化的,熟悉现象,而并不了解机理。由于对企业家真正财富认知的错位,使中国人普遍忽视了企业家金钱财富背后的宝藏——企业家精神。就此意义上讲,历史和现实诸多制度变革的错位内在都与认知企业家精神的理念缺失有关。明乎此,便能解释:何以在社会的意义上,对企业家缺乏尊敬心理,在个人的意义上,对企业家缺乏学习的心态。这种忽视的结果是,中国企业家远不如西方企业家活得那样自信洒脱,而社会民众又缺少孕育企业家精神的创业冲动。

在笔者看来,如果把个人与社会的发达比作一棵大树,企业家精神就是这棵大树的根!

想增值就必须投资到产业资本形态上,这是常识。也许现代社会资本运动形式更加复杂多样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使用资本没有免费的午餐,讲求回报是根本的。若把上述观点引申一下,融入滨海新区的资本在金融机构业内运动是一个层次,但将其固化下来,以产业资本的形式运动就是另一个层次。

在中国现阶段,产业投资的利润率说其平均化也好,说其很少有超额利润的产业缝隙也好,总之,投资的回报率已经趋于平稳。因之,资本的活跃程度,向哪里流动,在一个点上聚集和融通的规模不是问题,而回报率才是问题。

趋势上看,国内资本市场开始向滨海新区倾斜,是看重这里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支点,有可能获得较高的回报,如此而已。换句话说,滨海新区发展金融若注重工具性手段,落实在投资上,而非指望资本市场和金融业自身的运动改善经济结构,那么如何用好资金就成为关键。否则,一次性融资,借钱不难,长期聚集资本就有麻烦了。没有回报或回报率达不到预期,资本怎样流入,也会怎样流出。

如此,结论有一点:天津滨海新区的强项是工业制造业,中央的定位很清楚,“现代制造业基地和研发转化基地”,发展的现状是处于二次工业化的过程中。因此无论是创造环境还是直接投资,对金融业的要求首先是支撑手段。

若对此观点不持异议,那么融通资本的前提是要进行彻底的投融资体制改革。投资必须要考虑效率,要靠回报率支持融资。当然这其中有些技巧,可以用新区掌握的自有资源作为杠杆,以小资本推动大资本运动,只是那些20多年来有行之有效的思路和方法还不彻底。虽然中央没有专门提投融资体制改革,但这绝对是综合改革试验的题中应有之义。投融资合在一起说,显然投融资是矛盾的方面,以此更彰显出融资的工具性手段性质。所谓“功夫在金融之外”,就是改革投资体制,并且要有长治久安的机制,然后投融资,才能打消人们的上述那些担忧,也是金融改革背后要跨出的实质性一步。这一步若跨不好,摔坏的不仅是资本和金融市场,而一定是滨海新区。